

金钱、情欲及其他 ——论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

王 峰 夏 盛

记得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谈到巴尔扎克时,往往提及莎士比亚,并将两人的创作及其笔下的人物相应相关地加以比较、评析。然而,两者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之外,但其主要特征则迥然殊异。那就是巴尔扎克塑造的典型人物,几乎没有反省、沉思,也极少大段的内心表白,而总是急匆匆地、不停顿地忙于行动。就以葛朗台来说吧,他不是整天往来奔走于索漠城和他的各个田庄、园场之间,就是频繁穿梭于他的经纪人、各类商人的交易事务之中。即使是暂留家中的片刻,也是为了策划下一个行动计谋,筹措又一桩商务买卖;而这一切,又如他的行动那样,出人不意的迅捷,层出不穷的变迭。倘若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描述,那么他的身上仿佛装有一架永动机,不停地在运行。其主轴是他对现实社会中金钱的作用和意义的清晰意识,动力便是基于这一意识而来的妄图永远占有金钱并使之无限增殖的欲念。随着这一意识的逐渐扩大、加深,欲念愈演愈烈,不断地启动着他的全部心智、能力,驱使了这架永动机的恒久运转。要知道,他既是克勤克俭、不辞辛劳的实干家,更堪称为是个精明机灵、多谋善断的巧干家,集小生产者、小商人的精打细算、处事审慎和大资产者、巨富的随机应变、雄浑魄力于一身。小说里说他的谋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保证着他随后“是只老虎,是条巨蟒”的每一次行动获取全胜。这样,他从大革命开始时的成家立业起,到八十二岁去世止,在这四十二年的时间里,及时抓准每一个时机,最大限度地利用每种可能,以致他的财富由最初勉强“凑成”的两千法朗猛然骤增到一千七百万之多,成为遐迩闻名的暴发户,索漠城的首富。

葛朗台用他特有的全部精力所攫取的金钱,使他荣登凌驾一切、支配一切的宝座。于是,在巴尔扎克的笔下,“现代人的上帝”不再是一堆冰冷的金属,没有生命的物质,而是具体的索漠城的葛朗台老头;而“钱能通神,金钱万能”这一现实社会的“绝对真理”,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依附着葛朗台,既成了他的灵魂,又化作这个“财神”的无边法力,甚至“他最琐屑的动作”,也被人们认定其中“有深邃的不可言传的智慧”,奉作不可忽视的预兆,不容轻慢的神示。不仅如此,就连他那间破旧不堪、阴暗潮湿的堂屋,也成了最令人神往的、香火缭绕的寺庙,紧紧地吸引着城里几个有资格进去的头面人物,在那支昏昏摇动的烛光中,做着一个个妙不可言的黄金梦。

由此看来,葛朗台不仅以超常的威力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言行,而且他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特征还以无从抗拒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潜移默化地起着恒久的支配作用。即使是在他去世以后,那些庄稼人却仍然感到老主人长留人间,把他看作是现实生活和精神王国里无

所不在的主宰。

为了进一步凸现葛朗台的形象,作者特意设计了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场景,并作了鞭辟入里的描绘。这时的葛朗台,“所有的生命都退守在眼睛里”了,他死死盯着堆在面前的金路易,感到自己“仿佛进入了极乐世界”。神甫为他做临终法事,让他亲吻镀金十字架上的基督圣像,“他作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并对女儿作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交待:“把一切照应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帐!”葛朗台生死之交瞬间的神态和动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全部追求和最后归宿。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金钱而存在的……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有别的痛苦。”^①

为了与上述场景、葛朗台的命运构成层次不同的鲜明对照,巴尔扎克具体描述了葛朗台的妻子、女儿以及老仆人拿依的不同际遇。

葛朗台的妻子,可以说是上帝最柔顺的羔羊,虔信自持、恬静隐忍的楷模。她在和女儿相依为命的艰苦岁月中,把全部的信赖和期待寄托于上帝和天国。在丈夫“顽强、严酷、冰冷”的身影和金钱的重压下,她“天经地义”地悉数交出了三十万陪嫁和遗产,却整日生活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诚惶诚恐”之中。女儿私赠积蓄的消息,吓得她心裂胆破,终于在丈夫的淫威下,从精神到肉体都彻底崩溃了。她临终时,作者无限同情地写道:“天国的光辉照耀着她”;然而,她终于抛下心爱的女儿,在凄惶不安中弃世离去,她又怎能进入所谓的“天国”呢?

至于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乃是“爱”的最忠顺的奴仆。她在向爱的祭坛奉献了一切之后,历经人间可怕的磨难,其中包括对母亲的死别。自接到查理自巴黎的来信后,她天真地以为经过苦苦挣扎、孤独漂流之后,自己的生命之舟可以靠近幸福的港湾,结果却是浆断舟沉,“希望的大海上连一根绳索,一块薄板都没有留下”。此后,“在家等于出嫁”,她虽继续着尘世的呼吸,然而在“伤心惨酷的劫数”后,一个破碎枯萎的灵魂,只能是虽生犹死。

说到老仆人拿依,数十年间忙家务、办杂役的里外操劳,使这个粗笨的乡下女子长见识,开了心窍。她对老主人和他的一切,像狗一样摇尾乞怜,教徒一般忠信虔诚。葛朗台去世后,她不仅享受到接替老主人、做主管的“快乐”,而且以终生积蓄作为丰厚的陪嫁,在“五十九岁的年纪”竟能“从闺女一变而成为人家的媳妇”。她过上了殷实满足的生活,“毫未见老的脸上,有一股幸福之气”。这个年青时没人要、讨人嫌的穷女子,到晚年变成了令人“十分眼热”、“受人祝贺”的对象。其命运转变的契机,就在于从几十年替葛朗台当牛作马的生涯中,悟出了金钱的特殊作用,学会了攒钱的出色本领。

与拿依相对照的是,欧也妮和她的母亲,这两个同葛朗台有着最亲近的天然关系的人,却被抛到痛苦的深渊里,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其间越陷越深。值得深思的是,规定她们命运的,正是作为妻子的丈夫和女儿的父亲葛朗台。是他有意为她俩亲自设置那间“阴森的、凄凉的”堂屋,命令他俩坐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上,“专心一意,像女工一样整天劳作”,既像被深锁在“最阴沉的修道院”里,又似被遗弃在“最凄凉的废墟”上。她俩与外界隔绝之下,自然不谙世情,不通人心,特别是对“现代的上帝”全然无知,对“唯利是图”的信条毫不懂得。她俩的纯洁,实际上是浅薄无知,与世无争不啻是懦弱无能。这样的痴人、弱者在那样的社会里被抛弃,遭吞噬。

充当财神爷的祭品,自然是必不可免的了。

写到这里,我们仿佛观看了一出完整的戏剧。作为主角的葛朗台的表演,堪称有声有色,身手不凡。他之所以获得如此的成功,还有赖于其他角色的默契配合。他们台上台下,烘托反衬,为主角的出色表演制造相应的氛围,使其能始终处于不变的中心位置,充分维系其主角身份。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册、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的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本质相同的人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能写出许多历史家没有起写的那种历史,即风俗史。”^②的确,巴尔扎克在他的“风俗史”中活现的人物,往往被某一种特性所统摄,如以父爱著称的高老头,嫉妒成性的贝姨,收藏成癖的邦斯,淫欲无度的于洛,还有本文所论述的以吝啬闻名的葛朗台,等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始终有一支激流在涌动、奔泻,宛若肌体的血液;有一股气息在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散发、喷溢,犹如生命的呼吸。这就是巴尔扎克笔下人物内心指向一致、猛烈地冲动着的情欲,也是作者用高度概括和典型化手法刻画人物的神来之笔。

综观历来许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很少有人像巴尔扎克那样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声息相通,“对社会关系有深刻的理解”(马克思语)。他总是情不自禁地一再走出宅邸、书斋,将整个血肉之躯投入社会,参与其间,被辗转翻卷,或抛起掷下,频繁地交替着充当最得意的弄潮儿和最失意的落魄者(以后者居多)。他在人生舞台上,是那样兴奋而迅捷地设计一个个行动的构想,随即满怀信心地付诸实践。他数度涉足于经商,办企业,搞交易,乃至参政,只要他认为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就身体力行,持之以恒,不折不挠。但无情的现实却捉弄了他,以致一败涂地,经济拮据,债台高筑。以写作为己任的巴尔扎克,也许倒是应当感激社会施予他的严酷;因为正是从一个个艰难的行动中,从一次次惨败中为他的创作获得了无价的财富,无量的积蓄。他深深地尝遍了金钱社会中的人生苦味,借助每一次行动,穿过社会的外在形相,钻进社会肌体的内部,深入其最细小、最活跃的细胞。在这样出神入化的观察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后,巴尔扎克兴奋地呼唤:“在这里,我们看见生活本身正在同……欲望交战!”他宣告:“热情就是整个人类。”他认为,在社会生活运动中,包含着个人切身利益的欲望激起了人们行动的热情;而热情的行动宣泄着人们的欲望。有鉴于此,他最缜密的观察和最得意的描绘,往往是掀起生活的无休止的喧嚣,推动着社会不断旋转的最内在的因素——一个人的种种内心情欲。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巨匠的巴尔扎克,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所着意描写的情欲,虽然是人物行动的最初始、最直接的动力,但并非自生自灭、无迹可寻的“天外来客”,与生俱来的“母体胎记”。这是因为,他对人的赖以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和人物活动的自身轨迹所作的具体描绘,都是对产生情欲的缘由的追根溯源的探求。事实证明,一定的情欲来自一定的社会现实,是生活时尚和社会风气在人物内心世界的长久积淀和集中凝聚,也是对社会意欲的及时的应答和作出的反响。因此,巴尔扎克所描写的情欲,不仅集中、强烈,富有感染力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同时也蕴含着丰富深厚的社会内容,成为人物的意向、意志、意绪铸就的现实的折射镜。

如前所述,葛朗台头脑里唯一的主导意识是不断获取并永远占有金钱。它主宰了葛朗台的心灵,启迪了他的全部智力、才能,把他造就成异常出色的干才,诚如作者并非夸大其词地说,倘使把他“奉派到国际会议中去,把他保护私人利益的长才在哪里表现一番的话,毫无疑

问,他会替法国立下大功”。正是这一意识也薰陶出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思想家,现实人生的哲学家。葛朗台一贯少言寡语,尤其是在与人做交易、耍手腕的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得结结巴巴,又聋又哑;不过谈吐虽少,却颇有些警句炼语,往往道出了人生的真谛。作者不仅展现葛朗台在主导意识统率下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使之成为金钱观念的体现,金钱力量的化身,以及他的存在和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充分显示了“金钱控制法律,控制政治,控制风俗,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着重描写了葛朗台的主导意识经年深月久的磨砺以后,在他内心化为一种主导情欲,使其具有了可用“吝啬”一词加以集中概括的鲜明特性,正如巴尔扎克在小说中所说:“他所有的情感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对此,作者紧紧抓住人物外在动作,加以细致描述,从中获得具体而充实的内涵:葛朗台的攫取金钱,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施展种种伎俩,整日价地里外操持,四出奔走,八方交涉。就其家庭而言,精于计算,他把全家的饮食起居,一切费用、支出降到最低限度,如亲自分发每一片面包,每一支蜡烛,自己动手修抽板,做酒桶,钉木箱……。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吝啬的特性,葛朗台的每一次行动,每一个举措,并不是分散零散、彼此孤立的,而是连成一个相关持续的动作系列,合成一个完整的、有机的行为过程,协同一致地说明了:葛朗台的吝啬是以金钱为唯一爱物,以占有金钱为毕生癖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③

更需提及的是,作者赋予葛朗台吝啬特性以具体的外在活动内容的同时,进一步扣紧人物内在情绪变化、思想发展,作多层次、多侧面的细腻描绘,从而将这一特性转换为执著强烈而又色调多变的情欲。

请看:当葛朗台从公债买进中大获其利时,兴奋得手舞足蹈,“踏着拿依所谓的舞步,嘴里唱起歌来”。对家人也“说说笑笑”,一副“和气得很”的样子,使全家“第一次有了融融泄泄的气氛”。这说明生意场上的得心应手,便这个严厉板滞的老头,骤然变成了活泼快乐的少年,可亲可敬的慈父。

那是新年的第一天,葛朗台由于又一次“投机的完全成功”,他一早起来,便自得其乐地哼起自编的小调。早餐之际,谈起金钱,眉飞色舞,是那样的情真意切,像是最富于幻想的艺术家在描绘他五彩缤纷的理想世界。谁知,就在这当儿,女儿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我的金子没有了!”葛朗台“仿佛听到了近旁有大炮在轰”,惊恐万状,手足无措。他得知女儿将六千法朗的私蓄赠给了情人查理,顿时气得“脸色发白”,大发雷霆,震怒地诅咒她是“该死的婆娘”,是条“毒蛇”,严厉地斥责她太狠心:“拣我最心疼的事伤我心”,“你勒死你的父亲”。为此,他囚禁女儿,让她受冻挨饿,作为对她的不可饶恕的惩罚。然而,这笔巨大的损失既突如其来,又无法换回,对他的打击无异于揪心摘肝。严惩妻女,却无补于他的损失,也消减不了他的痛苦。自此以后,他“说话也少了,买卖上更苛刻”,以图力争将失去的钱再赚回来。不过,素以在算计上“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的葛朗台,竟然“弄错数目的事也常有”了。生机旺盛、精明能干的“好家伙”,在这沉重的一击之下,失魂落魄,力不从心,垂垂老矣!

倒楣的事却接踵而来:几个月以后,葛朗台又遭到了更可怕的“晴天霹雳”的袭击。原来,他从公证人那里得悉,妻子亡故,便需向女儿报帐;女儿还要继承母亲的财产,和他分家。听到这一讯息,他“痛苦地挣扎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爆发出一声惨厉的呼喊:“人生太残酷了,太痛

苦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但奸诈老辣的葛朗台，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很快地迫使自己从慌乱中镇定下来，拿稳主意，尽一切努力，打胜这决定命运的最后的一仗。在他看来，保住“金铸的女儿”，也就保住了全部家产，因而立即宽释了欧也妮，亲自“挽着她去用饭”，“几小时地望着她，眼睛的神气差不多是慈祥的了”。此时此刻，葛朗台对金钱的热切关注和挚爱，化作了对女儿的百般温柔和体贴。在诱哄女儿放弃财产继承权的片刻，他“紧张得脑门上尽是汗，一刻不停地抹着”，至高至尊的“现代的上帝”竟然成了等待判决的囚犯，而法官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当欧也妮答应签字后，他活像一个被释放的死囚，兴奋异常，激动万分，“热烈地拥抱着女儿”，“把她紧紧地搂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并感激地说：“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祝福你！”高兴地欢呼：“我有了命了！”这样，作为“救命恩人”的欧也妮，在葛朗台的眼里，又变成了被他彻底击败的对手。于是葛朗台从死里逃生的狂喜相应地为又一次巨大交易成功的满足、得意之情所代替。

仅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就足以说明贪婪、吝啬之于葛朗台，决不是一般的习性，而是一种独具的情欲了。他的行为、动作充溢着不可扼抑的激情；而且这种激情随着不同场合、境遇的转移又是那样丰富多变。显然，这样的人物，自然不再是善或恶的固定容器，某种思想观念或某一性格类型的图制木偶，而是一个神形兼备、七情俱全的活物。这一特定的形象，有力度，有弹性，清晰可见，触手可感；而且葛朗台的情欲指向一致，形成了一个动作系列和行为过程，具有连贯性和坚定性，充分地反映了他性格的内涵。

由上可见，巴尔扎克描写的葛朗台的情欲，是人物的催生剂，使葛朗台具有充沛活力、丰满血肉；它又是聚合剂，将他的各种活动彼此相联、互为存在。这样，葛朗台外在动作和内心态势贯通一体，相得益彰，使人物塑造和社会批判同步进行，双管齐下。鉴于这种批判不是停留在现实表象之上，而是渗透到心灵剖析和性格刻画之中，从而扩大了揭露的广度，增强了批判的深度，使小说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巴尔扎克在叙写葛朗台从贪婪、吝啬中获得现实生存的超然力量的同时，更强调其从葛朗台身上产生了不容抗拒的致命力量。如我们所看到的，葛朗台的贪吝来自他年深日久地追钱逐利的社会生涯，对现实社会中金钱观念的深刻认识；故而作者越写出这种情欲的浓烈，就越显示了金钱观念对人心浸润之深，毒化之甚。它宛若可怕的地狱之火，将葛朗台对生活和人类最起码、最正常的感情焚烧殆尽，然后又熔铸出一个扭曲变形的混世魔王。其法道之高，能“使买卖人也受他愚弄，使法律也帮助他做违法的事”；其能量之大，可喝令全城人甘心臣服于他之下，将巴黎人轻而易举地玩弄于股掌之上；其凶狠之极，则为一小包金币（女儿平时的积蓄）置父女情、夫妻恩于不顾，无情折磨女儿、活活逼死妻子而泰然自若。

面对着巴尔扎克笔下的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我们再也无法发出笑声，像看到法国著名戏剧家莫里哀所刻意塑造的卑劣而下流的悭吝人；也不能嗤之以鼻，如对待俄国杰出的讽刺大师果戈理所生动描绘的昏聩老朽的吝啬鬼普柳什金。这是因为：我们真切地目睹了那个金钱社会在制造恶习的同时，滋生了恶习的制造者；在繁衍罪孽的同时，孕育出罪孽的繁衍者。正如作者自己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思想，或者兼有思想和感情的情欲，固然是社会的元素，它也是社会带有破坏的元素。”^④我们深深地震惊于小说所描写的被完全异化了的人性的异化力量，被彻

底摧残了的灵魂的摧毁力量。

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可知巴尔扎克对人物的生活历史和生存环境所作的真实描写,为葛朗台这一形象的产生、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来源,打下了坚实的现实基础。正是这一前提和条件,使巴尔扎克写出了—个既不可思议、又真实可信;既可恶可笑、又可惊可畏的葛朗台老头。这种矛盾复杂的客观效果,既是社会生活的使然,又与作者主观的内在意绪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因而它具体地显示了小说现实主义创作的扎实深厚,同时也维妙维肖地透露着作者内心的复杂情思。

巴尔扎克在二十岁那年,拒绝一切劝阻,发誓要作个文学家,并开始了义无反顾的创作实践之后,又再三投身于各种经济冒险,而且是败而不馁,挫而不折。正如他在长篇小说《驴皮记》中所表白的:“一个预感到有美好前途的人,当他在艰苦的人生大道上前进时,就像一个无辜的囚徒走向刑场,一点也不用羞愧。”其所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和巴尔扎克自身活跃个性的焕发外,还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驱策力,那就是对金钱带来的种种利益和激起的对快乐的渴望,以及藉金钱摆脱经济困境、获得优越社会身份的梦想。这从他的书信、同时代人的回忆、有关评论中均可窥知。小说中的葛朗台,有时机敏过人,多谋善断,堪称精通韬略,令人叹服的谋士;又俨然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将才。葛朗台随着钱财日增、地位日升而踌躇满志,得意非凡,对此,作者写得可谓神情毕肖,栩栩如生。究其原因,作者是否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失败的经历、一贯受挫的行动,由葛朗台的一路顺风、财源广进而获得幻想中的弥补呢?也就是说,葛朗台从白手起家到发财致富,是否能帮助巴尔扎克从常年极度困扰着、追逼着他的“最残酷的经济困境”中得到一些暂时的转移和精神上的解脱呢?应该说,巴尔扎克终究迥然有别于利禄之辈,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崇高的人生使命。面对金钱场上的急剧角逐,他虽频频投身进去,陷入其中,但又能一再挣脱出来,跳出其外,回到自己的根本立足点来。他既是热衷的参与者,更是清醒的观察者,紧张的探索者。因而,他对于具有强烈吸引力的金钱,既爱之有利可图,用以排难解纷,又恨之它能把人送进天堂或打入地狱的驾驭力量,而对金钱所造成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严重恶果,他更是扼腕痛惜,奋笔疾呼。巴尔扎克在对《欧也妮·葛朗台》这出活剧的导演过程中,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内心种种不甚谐调的情绪、意念、熔铸其中,贯穿其间,染上了他的生活色素和性格色彩,从而使笔下的葛朗台形象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成为《人间喜剧》中“最完善的绘写之一”。

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4页。

②王秋荣编《巴尔扎克论文学》第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

④《巴尔扎克论文学》第64页。